

史學四種



中国当代史学家丛书

吕思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史学四種

责任编辑 戴子腾
封面题字 胡文遂
封面装帧 邹纪华

史学四种

吕思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常熟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 字数 164,000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300

书号 11074·491 定价 (七)0.92 元

《中国当代史学家丛书》编辑说明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祖国经历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变革。在这汹涌澎湃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时代的要求，史家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各自以其史学研究的成果，作出了丰硕的贡献。我们编辑这套丛书，希望通过它能够提供一个我国当代史学发展的概貌。这对于接受先行史家们的教益，吸取他们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辨识当代各个史学流派，进而开展中国史学史的学习和研究，总结当代史学发展的历程，探求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等，都是有意义的。

在这半个多世纪中，革命实践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史学水平不断提高。当代史家们在史学研究领域中，或在史学理论方面，或在治史方法方面，或在历史编纂方面，或在史学评论方面，或在典章制度、文物、历史地理、乃至宗教史料的考辨方面等等，各有其专门或侧重，成果累累。丛书以人为主，选收各自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和致师友的论学书札。

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编辑工作中难免存在这样和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在编辑这套丛书过程中，得到各方面尤其是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在这里敬表谢意。

吴 泽

一九八〇年四月

出版说明

《史学四种》是吕思勉先生的遗著。

吕先生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生于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卒于一九五七年。他是我国老一辈的史学家，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盛名，在中国通史、断代史以至民族史、学术史、史学史等方面，写了大量著作，已经出版的大约五、六百万字，尚有近百万字的札记，正在陆续整理准备出版中。

吕先生从二十三岁起，就决心献身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当时，他基本上运用清代乾嘉学者整理史料的方法，每读一本历史书，都要把史料分门别类，仔细排比，加以融会贯通，写成许多札记，他的不少历史著作，就是从札记的基础上写成的。他治学严肃，作风踏实，五十年来，曾经从头到尾把二十四史读过三遍；并参考其他史书，作考订和研究。但是他治学的目的，根本和乾嘉学者不同，他并不是单纯作历史的考据，他之所以要掌握大量史料，加以排比考订，无非是为了认清历史事实的真象，以便进一步对社会历史的变迁，作好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因此，他也十分重视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史学四种》就是吕先生探讨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之作。

《史学四种》包括《历史研究法》、《中国史籍读法》、《史通评》及《文史通义评》四种，除《史通评》和《历史研究法》曾在三十年

代、四十年代刊行外，余两种都是未刊的稿本。

《历史研究法》曾于一九四五年由永祥印书馆出版。本书指出“史学系事实的，主于理知”；研究历史，读书要多，基础应广，不仅社会科学如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人生哲学和史学不可不知，即考古学、地理学、文学以至自然科学都要涉猎。特别是对社会学应该留意，主张着重探索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要知道史事是进化的”，要“打破昔人循环之见”。

《中国史籍读法》是未刊讲稿。一九五四年，华东师范大学请吕先生为历史系毕业生讲课，开学后，他即生病，因于“病闲后曾写出崖略”，自称：“既未能精密构思，亦未能详细参考”，其实稿中颇多持平之论。如说旧史书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确有某些“颠倒是非”的地方，象讲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冲突，则“归由”于少数民族，“而不着汉族压迫之迹”；但又指出旧史的著述也还有一定的依据，不能说旧史所载事实“无一可信”，必须认真加以分析。又如，他说旧史书的缺点“偏重于政治”，以致“偏重战争和过度崇拜英雄之弊，必相因而起”；但又指出“政治不可偏重，非谓政治可以不重”，政治历史还是整个历史的重要部分。这些，都倾注着研究历史要重视实事求是的精神。

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和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我国过去讲究史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著作，向来是史学工作者必读之书。《史通评》和《文史通义评》，就是吕先生通过对这两本书的评述，来阐明历史研究方法的。《史通评》曾于一九三四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史通义评》则未梓行。前书就《史通》各篇加以平议、推论，亦附考据辨证；后书谓《文史通义》虽有“违失偏激之处”，“其说不必尽合于今；然精深透辟，足以矫前此之失，而为

后人导其先路甚多”。对章学诚的不满汉学，讥刺宋学，也给予一定估价。他还综论两书，认为刘知几和章学诚“之意相反”，是“时代为之，不足为非”。说“刘氏之时，史书尚少，披览易周，故其所求在精详，不在扼要；欲求精详，自以断代为易。章氏之世，史籍之委积既多，史体之繁芜尤甚，编览已云不易；况乎提要钩玄，删繁就简，实不容已，此其持论之所以不同也。”（《六家第一》）

《史学四种》多是吕先生早期谈论历史研究方法的作品，分量虽少，涉及的面很广，可从中看到吕先生对史学的见解。如果把前后作品加以比较，也可以看到，随着时代的进步，吕先生治史的理论和方法也在不断地改进。吕先生基于实事求是的精神，早在一九四五年发表的《历史研究法》中，就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表示了赞同的态度。他说：“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建国以来，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在《中国史籍读法》中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学说，观鉴社会的变迁，因以发明其发展之由，推测其前进的方向，而决定因应及促进之法，这自然是最有用的。”同时还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与当代之事相结合，曾经讲到，马克思通过社会实践，“看了被压迫阶级的苦痛，深知其与社会组织相关，然后求之于史，而知其变迁、发展之由；必非于当代之事茫无所知，但闭户读书，铢积寸累，而得一贯串全史可以用诸当代的新发明。”在前辈的史学工作者中，吕先生能够随着时代而前进，这是他的可贵之处。当然，长期的旧的思想观点的影响，不

可能截然摆脱,这些书稿又大都是早期写的,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旧的痕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尽管如此,吕先生毕生专心致志地从事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工作,在治学方法上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史学四种》正是他潜心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经验积累,他不仅对治中国史学史的同志有帮助,即其他史学工作者也可借镜,因汇辑成书,提供参考。

目 录

历史研究法

第一章	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1
第二章	历史的历史	5
第三章	史学进化的几个阶段	12
第四章	旧时历史的弊病何在	17
第五章	现代史学家的宗旨	23
第六章	作史的方法	29
第七章	研究历史的方法	35

中国史籍读法

弁言	45
一、史学之用安在	46
二、中国有史学么	48
三、再为中国史学诉冤	51
四、史权为统治阶级所篡	54
五、读旧史宜注意之点	62
附录一：古书名著选读拟目	70
附录二：关于正史	72
六、读旧史入手的方法	74
七、治古史的特殊方法	81

史通评

内篇	94
六家第一	94
二体第二	102
载言第三	102
本纪第四	104
世家第五	104
列传第六	106
表历第七	106
书志第八	108
论赞第九	109
序例第十	110
题目第十一	110
断限第十二	111
编次第十三	112
称谓第十四	113
采撰第十五	114
载文第十六	116
补注第十七	116
因习第十八	118
邑里第十九	118
言语第二十	119
浮词第二十一	120
叙事第二十二	121
品藻第二十三	123
直书第二十四	124
曲笔第二十五	124

鉴识第二十六	126
探蹟第二十七	127
模拟第二十八	127
书事第二十九	128
人物第三十	129
覈才第三十一	129
序传第三十二	129
烦省第三十三	130
杂述第三十四	131
辨职第三十五	132
自叙第三十六	133

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	134
古今正史第二	145
疑古第三	159
惑经第四	170
申左第五	172
点烦第六	177
杂说上第七	188
杂说中第八	189
杂说下第九	189
《汉书·五行志》错误第十	190
《五行志》杂驳第十一	190
暗惑第十二	190
忤时第十三	191

文史通义评

序	192
---------	-----

易教上	194
易教中	197
易教下	199
书教上	200
书教中	202
书教下	203
诗教上	205
诗教下	207
经解上、中、下	208
原道上、中、下	211
原学上、中、下	212
博约上、中、下	213
言公上、中、下	215
史德	216
史释	217
史注	217
传记	218
习固	218
朱陆	219
文德	220
文理	220
文集	221
篇卷	222
天喻	222
师说	223
假年	223
感遇	223

辨似	224
说林	224
知难	226
释通	226
横通	226
繁称	227
匡缪	228
质性	228
黠陋	228
俗嫌	228
臧名	228
砭异	229
砭俗	229
申郑	229
答客问上、中、下	229
答问	230
古文公式	230
古文十弊	232
浙东学术	233
妇学、妇学篇书后	233
诗话	233
附录: 章学诚之史学思想	234

历史研究法

第一章 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历史到底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有什么用处？

提出这一个问题，我知道多数人都能不待思索而回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那就是：从前的人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大家认为好的，我们可奉以为法，照着他做；失败的，大家认为坏的，我们当引以为戒，不照着他做。姑无论成功失败，不尽由于做法的好坏；众人所谓好坏，不足为准；即置以二者于弗论，世事亦安有真相同的？执着相同的方法，去应付不同的事情，那有不失败之理？在社会变迁较缓慢之世，前后的事情，相类似的成分较多，执陈方以医新病，贻误尚浅，到社会情形变化剧烈时，就更难说了。近代世界大通，开出一个从古未有的新局面，我们所以应付之者，几于着着失败，其根源就在于此。所以愤激的人说道：历史是足以误事的。因为不读历史，倒还面对着事实，一件新事情来，要去考察它的真相，以定应付的方针；一有了历史知识，先入为主，就会借重已往的经验，来应付现在的事情，而不再去考察其真相；即使去考察，亦易为成见所蔽，而不能见其真相了。如咸丰十年，僧格林沁把英、法兵打败了，薛福成的文集里，有一篇文章记载其事，深致惋惜之意。他说：“咸丰

八年，业经把英、法兵打败了，这一次如能再打一个胜仗，则他们相去数千里，远隔重洋，不易再来第三次，时局就可望转机了。”近代世界交通的情形，是否英、法再战败一次，即不易三来？当日清朝腐败的情形，是否再战胜一次，时局即可望转机？我们在今日看起来，可谓洞若观火，而在当日，号称开通的薛福成竟不能知，这也无怪其然。当日英、法的情形，自非薛氏所能洞悉。然使薛氏而毫无历史知识，倒也不会作英、法再败即不易三来的推测。有了历史知识，照历史上的成例推测，相去数千里，远隔重洋，而要兴兵至于三次、四次，确是不容易的，无怪薛氏要作此推测了。据此看来，历史知识足以误事之言，并不能说它不对。然而没有历史知识，亦未尝不误事。当袁世凯想做皇帝时，先由筹安会诸人列名发出通电，说要从学理上研究中国的国体问题，到底君主民主，孰为适宜？当时大家看见这个通电，就说：袁世凯想做皇帝了。我却不以为然。我说：这其中必然别有缘故，深曲隐蔽，不可轻于推测。为什么呢？我以为生于现今世界，而还想做皇帝；还想推戴人家做皇帝；除非目不识丁，全不知天南地北的人，不至于此，以此推测袁世凯和筹安会诸人，未免太浅薄了，所以我有此见解。然而后来，事情一层层披露出来，竟尔不过如此，这不是一件奇事么？此无他，还是缺乏历史知识而已。据这件事情看来，历史知识是不会误事的，所以误事，还是苦于历史知识的不足。这话怎样讲呢？须知道世界上是没有全无历史知识的人的。我们和人家谈话，总听得他说：从前如何如何，这就是历史知识。所谓历史，原不过是积从前如何如何而成，所以此等人和专门的史学家，其知识之相去，亦不过程度之差而已。袁世凯和筹安会中人，想做皇帝，想推戴人家做皇帝时，亦何尝

没有他们的历史知识？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是如此做成的；推戴人家做皇帝，是如此而成功的；岂能说是没有？以当时的情形而论，反对的人，自然不会没有的，然而据历史上的成例推测，岂不可期其软化？即有少数人不肯软化，又岂不可望其削平？这个，据着他们仅有的、一偏的历史知识推测，自亦可以作此断案，自不免于希冀侥幸。倘使他们再多读一些近代的外国历史；倘使他们的心思再能用得深一点，知道历史上的事情前后不符的甚多，未可轻易的执着前事以推断后事；他们自然不至于有此失着了。所以说：误事的不是历史知识，只是历史知识的不足。

历史上成功的，大家所认为好的事情，既不能摹仿；据历史上的成例，以推断事情，又易陷于错误；而没有历史知识，又要误事；然则如何是好呢？须知道：应付事情，最紧要的，是要注意于学与术之别。学是所以求知道事物的真相的，术则是应付事物的方法。浅薄的人往往说：我能够应付就得了，事物的真相，管它干么？殊不知你知道了事物的真相，应付的方法自然会生出来，只有浅薄的应付方法，则终必穷于应付而后已。浅近些说：我们要做一张桌子、一张椅子，这自然是有成法可循的，然而木料之类，有时而不凑手，怎样办呢？倘使你只会按照一定的样子做，就要束手无策了。如其你明于原理，那就可以随时变化。桌面上是要安放东西的，所以要是个平面，只要是平面，其形状是正方的，长方形的，正圆的，椭圆的，甚而至于都不是的，却不是顶紧要的条件。普通的桌、椅，总是四只脚，那是求其安放得牢，然则只要安放得牢，三只脚也未尝不可以；倘使只有一根粗的木材，能够撑定在中间，也未尝不可以；又何必定要四只脚呢？这

是举其两端为例，其余可以类推。做桌、椅是最呆板的事，尚且如此，何况较活动的事？何况所应付的是人而不是物呢？然则事物的真相，如何能够知道呢？那史学家有一句名言道：“现在不能说明现在。”为什么现在不能说明现在呢？那是由于一切事物，有其“然”，必有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是不会了解其然的性质的。我们要用一个人，为什么要打听他的出身？为什么要打听他的经历？岂不以一个人的性格、才能等等，就是他的出身、经历等等造成的。我们试再反躬自省：我为什么成为这样子的我，岂不和我所生长的家庭，我所肄业的学校，我所交往的朋友，我所从事的职业，都有很大的关系？倘使我生在别的家庭里，在别的学校里肄业；我所交往的朋友，换过一班人；我所从事的职业，也换成别一种；我岂能成为现在的我？我们再放眼纵观：我们所认得的人，为什么成为他现在这个样子？读书的人多少有些迂腐气；做官的人多少有些官僚气；生意人多少有些市侩气；白相人多少有些流氓气；这是为什么？他们是生来如此的么？然则中国的社会，为什么和欧洲不同？欧洲的社会，为什么和日本不同？甚而至于英国和美国不同；日本和朝鲜不同；就中国的社会，南北风气亦不能尽同；其故安在？就可以深长思了。寻常人对于一切事物，大都不甚深求，所以觉得不成问题。其实略加思考，任何事物，所以如此，莫不有很深远的原因在内；深求其故，无不可以追溯至于极远之世的。固然，我们对于一切事物，总不能真正寻根究柢，然而多知道一些，毕竟要好一些。然则历史怎好不研究呢？

有人说：你的话是对的。可是已往的事情多着呢，我们如何能尽记，亦且如何能尽知？这话不错。一天的新闻纸所载，奚啻